



“五心烦热”并非全属阴虚

五心烦热，是某些疾病常见的证候。一般说来此症大多责之阴虚火旺；但由其他原因引起者，亦不乏其例。笔者在长期临证中，曾治过不少湿热内蕴引起的五心烦热，有蕴郁肾经的、有困阻脾胃的、有留恋气分的，现录不久前治愈肝胆湿热引起之五心烦热一例于下，以说明“五心烦热”并非全属阴虚，供广大读者进一步验证之参考。

周××，女，46岁，某医院职工，1982年5月12日初诊。患者曾于1978年手术取出“胆囊结石”，右胁下时感胀闷隐痛，近月来，胁肋胀痛加剧，伴有脘痞泛恶，口干苦纳呆，喜冷不欲饮，两手足心发烫，心胸烦热，急躁易怒，面部时觉烘热，心悸阵作，尿黄。曾用清泄肝火、疏利肝胆之剂而无效。舌胖大、色红(边尖尤甚)、苔浊腻微黄，脉弦滑而数。诊为湿热蕴于肝胆，以宣气化湿、清泄肝胆为治，方选蒿芩清胆汤合三仁汤出入。处方：青蒿12克，黄芩10克，枳实12克，姜半夏10克，竹茹12克，生苡仁30克，白蔻仁6克(后下)，赤茯苓12克，通草10克，金钱草30克，藿香15克(后下)，佩兰15克(后下)，碧玉散10克(包煎)。三剂。5月15日二诊，胁肋胀痛已止，余症均大为减轻，腻苔渐化，予原方续服5剂。5月22日三诊，症情续有好转，原方加减。服五剂后随访，诸恙悉瘳。

本例舌质红而胖大湿润，且复以浊腻黄苔，结合头身困重、脘痞纳呆、口苦泛恶，以及胁肋胀痛、烦热易怒等症，肝胆湿热显而易见。肝胆相表里，中寄相火，肝胆湿遏热郁，相火因而炽盛，上冲则颜面烘热，扰心则心悸心烦。湿为阴邪，阴邪自旺于阴分，故手足心热。再以湿热证而论，它是热蓄湿中，湿寓热内，两者搏结不解，热得湿而愈炽，湿得热而愈横，徒清热则湿不退，徒祛湿则热愈炽，故吴瑭提出“湿热两伤，不可偏治”的治疗原则。此例患者虽未误用滋阴降火药，但先前服清肝泄热之品，月余未效，就是因光看到热而未顾及湿，以致如此。本例以蒿芩清胆汤合三仁汤加减，既具清泄肝胆之效，又有宣气化湿之功，两者兼顾，宜其湿化热退，疗效显著。足见前人

经验之可贵。说明治病要知常达变。决不能固执成见，胶柱鼓瑟，庶可使主方遣药丝丝入扣，恰合病机。

江苏省海门县中医院 石坚如讲述
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79级 孙伯青整理

谈古人著书校勘之疏忽大意

古人谓立言传世，可与立德、立功并列，为三不朽。故著书立说，或校勘工作，须极其严肃认真，不能稍有粗疏苟且。然中医典籍浩繁，其中鱼龙混杂，在所难免。即便医学名著，亦有白璧微瑕，疏忽谬误之处，顺手拈来，即有数例。

(一) 赵养葵《医贯》，阐发命门真阴真阳之说，不无可取，然书中疵谬不少。如引述古方，桂枝汤无姜枣；小柴胡汤仅录柴胡、黄芩、甘草三味；白虎汤却增入人参、竹叶，粳米改作糯米等，比比皆是。而论金匱肾气丸则曰：“此方以八味丸为主……又有车前、牛膝二味，最为切当，方见《金匱要略》，故名金匱肾气丸”，将《济生》方误作为《金匱》方。其最无稽者如“消渴论”一节云：“……昔汉武帝病渴，张仲景为处此方，至圣玄关，今有可想，八味丸诚良方也。”难怪徐洄溪贬之曰：“仲景是汉献帝时人，与武帝相去三百余年，明明可考，乃造出此语何耶？赵氏所谈，无往非梦，此则又梦之最不经者！”

(二)《温病条辨》风行海内，至今170年。吴瑭自序，开首即说“立德立功立言，圣贤事也”，明示著此书之郑重。其“凡例”则曰：“是书虽为温病而设，实可羽翼伤寒。”然而，若论精细谨严，吴氏去仲景远矣。试观《伤寒论》桂枝汤增桂之量则曰“桂枝加桂汤”，四逆汤重用干姜则冠以“通脉”二字，仲景处方用药，一丝不苟，法垂千古。吴氏侈言“是书仿仲景《伤寒论》作法”，试观其冠《条辨》诸方之银翘散是如何仿法。银翘散由十味药组成，方中原无元参。如“上焦篇”第4条，银翘散方加减法曰：“……项肿咽痛者加马勃、元参。”“中焦篇”第22条：“阳明温病，下后疹续出者，银翘散去豆豉，加细生地、大青叶、元参、丹皮汤主之。”银翘散中确无元参甚明。然“上焦篇”第16条：“……发疹者，银翘散去豆豉，加细生地、丹皮、大青叶，倍元参主之。”所列方药标明“元参加至一两”，如

此则银翘散原有元参五钱矣。又“上焦篇”第40条：“太阴伏暑，舌白、口渴、有汗，或大汗不止者，银翘散去牛蒡子、元参、芥穗，加杏仁、石膏、黄芩主之。”则银翘散又应有元参矣。忆六十年代，医学杂志曾有银翘散究竟有无元参之争。余意此实吴氏粗疏之过，后人无需争议。

《温病条辨》有青蒿鳖甲汤二首。一首见于“中焦篇”第83条，治“脉左弦，暮热早凉，汗解渴饮，少阳疟偏于热重者”，药用青蒿、知母、桑叶、鳖甲、丹皮、花粉六味，此条录自《临证指南》卷四疟症门翁姓案。另一首见于“下焦篇”第12条：“夜热早凉，热退无汗，热自阴来者，青蒿鳖甲汤主之。”药用青蒿、鳖甲、细生地、知母、丹皮五味，此条录自《临证指南》卷三温热门王姓案。两方皆名“青蒿鳖甲汤”，而药味主治各异，且皆出自吴氏一人手笔。其粗心大意，竟至于此。

(三) 王孟英笃实精思，似胜吴塘一筹，然亦不免有疏忽之处。《温热经纬·叶香岩外感温热篇》第九章论绛舌：“……舌绛而光亮，胃阴亡也，急用甘凉濡润之品……”王氏按语云：“光绛而胃阴亡者，炙甘草汤去姜桂，加石斛，以蔗浆易饴糖。”此乃误将小建中汤之饴糖移植于炙甘草汤中。王氏既一时大意记错，惜后又不加细校。而最妙者乃汪谢城，此人宦而知医，对王氏著作，多加评语。倘汪氏遵孔子直、谅、多闻之教，细加校勘，不难发现此误：奈何他一见王孟英上语，赞谀之辞便溢于言表，评曰：“以蔗浆易饴糖，巧妙绝伦”，实属笑谈。

(四) 何廉臣《重订广温热论》搜方颇广，其中嘉道以后之经验新方，尤足珍惜。惟其录方太多，重出之方不但未能察觉，且妄加比较，以致错上加错。此书第二卷“验方”一章，既有“安宫牛黄丸”又有“新定牛黄清心丸”，两方药味、药量、制法、服法完全相同。其实即一方也。何氏每采近世验方验案，或安上新名，或冠以“新定”两字。经笔者对校，其中“新定牛黄清心丸”乃何氏录自《温热经纬》者。只因王孟英贬抑《温病条辨》，不用其“安宫”之名，只云“一方”；何氏不曾核对，误认为另是一方。当然，忙中有错，在所难免；但何氏却加上按语云：“安宫牛黄丸最凉，瓜霜紫雪丹次之；犀珀至宝丹，牛黄清心丸，新定牛黄清心丸，万氏牛黄丸又次之……临用对症斟酌可也。”同是一方，只因方名之异，竟说成一则“最凉”，一则“又次之”，岂非笑话？

著书疏忽之误差已如上述，编辑校勘医书，若粗心大意，亦可出差错。如：

(一) 世所传《徐灵胎医书十六种》，其中《难经经释》、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、《伤寒论类方》、《兰台轨范》、《医学源流论》、《医贯砭》六种，以及徐氏晚年（乾隆丁亥，1767年，时年75岁）所作之《慎疾刍言》可确信为徐氏真作。《洄溪医案》乃王孟英于咸丰五年所得之抄本，亦似徐氏手笔。其余则不能肯定为徐氏真作。如《六经病解》几乎全抄自柯琴《伤寒论翼》，亦无徐氏补正批注之文。又如《伤寒约编》，文辞义理皆与徐氏真作不类。而近世左季云所编之《伤寒论类方汇参》所列诸方，一是仲景原方药量，二是洄溪用量，其意殆谓古今铢两不同，应有所变通，用心非不善也。然其所谓“洄溪”用量者，实出自《伤寒约编》，可知左氏误认此书乃徐氏所作。而《伤寒约编》所用经方，多违仲景法度。更荒诞者，此书乃将“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，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主之”，误为“桂枝去芍药生姜加人参新加汤”，且妄加注释，以说明去芍药、生姜之理。可知实非徐作，这显然乃左氏失察致误。

(二) 裘吉生主编之《珍本医书集成》，亦有明显校勘核实之误。如《医医偶录》，一望而知即流行甚广之《笔花医镜》，仅在《医学三字经》之附录中抄录数条，遂变成“陈修园晚年教子所作”（见原书《提要》），并且杜撰有陈氏自序一篇，书明作于嘉庆癸亥（1803年），其中有云：“某今年七十有七……”。考陈修园约生于1753年，癸亥年仅五十岁耳，校勘者之不察如此。

又《宜麟策》及其《续编》，乃裘氏自己校勘者。其《提要》云：“本书一卷，续集一卷，著者佚名，惟总论中自署曰宾，因不知其姓，无从考证”。真使人怀疑裘氏校勘时是否细看全书。因《续编》第一句即曰：“张景岳先生《宜麟策》为求嗣者必读之书，今采诸书各论，编成四类以续之”。则《宜麟策》之作者当是张景岳，而“自署曰宾”之疑团亦可冰释（景岳名介宾），何得云“不知其姓，无从考证乎”？惟续作者尚未署名耳。裘氏乃医界名宿，校勘医书，竟大意若此，真不能不为贤者讳也。

以上所述，非敢对古人之书肆意吹求，余中年时，亦有此失，及今思之，心犹怦然。缘昔年读周岩（伯度）所著《六气感证要义》（《珍本医书集成》本），喜其词理明畅，诵读不辍。且其自序明言“集中注拙拟者百余条，悉注家履齿所未经……”，余深信皆周氏所自拟者。1963年余治愈暑温后期眼球震颤全身瘫痪一例，撰文投寄医刊，文中引述周岩“拙拟”一条云：“夏月人身之阳，以汗而外泄，人身之阴，以热而内耗，阴阳两有不足……”，及后细思，此语甚熟，不知在何

书中见过。一日,某生谓余曰:“师教我等流览喻氏书,今发现此语早已见于《医门法律》”。检视之,果然。周岩剽窃前人名言为己有,余不察,遂受其欺。惜此文已发表,无从更改,懊悔莫及。嗣后写作乃不敢草草。十年动乱期间,文风不正,流毒海内,医界亦受其害,粗滥之作不少。已往不谏,来者可追,笔者本古为今鉴之旨,聊摭数则,一以自警,且与同道共勉云尔。

广东省东莞县中医院 何炎燊

《丹溪手镜》并非丹溪亲撰

《丹溪手镜》(以下简称《手镜》)一书,1982年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。对本书校点者付出的辛勤劳动,笔者表示由衷的敬佩。校点者在该书的“校点前言”中说:“丹溪著作甚多,如《格致余论》、《金匱钩玄》……等,然多出自门人之笔,惟《丹溪手镜》一书,则系亲手撰写。”对于这一说法,笔者实难随同,故抒己见,请予指正。

本书“校点前言”提出“亲撰”的论据是:“该书序言中说:‘《手镜》一帙,为先生所秘惜,左右行游,常挟与俱,不轻以示人’”。笔者认为,序言的作者陈乾阳,既不可能亲眼看到三百年前的朱丹溪临证时携带何书,又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以为凭,怎么知道丹溪“秘惜”《手镜》“不轻以示人”呢?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说:“《丹溪手镜》二卷,此为清常手校本,序称丹溪著医书数帙,皆行于世。此乃耄年所作,故传之独秘独迟,未知清常从何本是正”。可见,钱曾对《手镜》出于丹溪之手,是有怀疑的。再者,《礼记·曲礼上》:“八十、九十曰耄。”朱丹溪活了七十八岁,可以称耄,既作于耄年,所以“独秘独迟”,就谈不上“常挟以俱”了。序言的作者无根据地编造这些不实之辞,无非是为了假丹溪之大名,抬高《手镜》的“身价”,以博取更多读者的信赖,扩大影响,这是我国古代某些医家论著中出现鱼目混珠现象的根源之一。

“校点前言”提出“亲撰”的另一论据是:“丹溪离世三百年后,才由其裔孙朱文英交出藏稿”。《手镜》虽出自丹溪“后裔”之手,但不能据此就可肯定此书即为丹溪所亲撰。笔者认为,丹溪亲撰的著作甚多,以宋濂、戴良之说最为详实可靠。他们三人生活在同一时代(元末明初),同一地域(金华府),均为当代名家,过从甚密。丹溪与宋濂是“忘年之交”,二人相谈“必极言而无所隐”,“故知先生之深者无踰于濂也”(见《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》)。若丹溪果真亲撰《手镜》,宋濂为何对此一无所知。戴良“通经史百家暨医卜释老

之说”(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),与丹溪志趣相投,称丹溪为“吾友”。在宋濂为丹溪写了墓志之后,他又“窃录其医之可传者为翁传”,写成《丹溪翁传》和《丹溪翁传赞》(见《古今图书集成·医部全录》卷五百一十八)。戴良在《丹溪翁传》中详细地记述了丹溪的学医经过、医学主张和九则较完整的医案,并阐明丹溪著述“乃徇张翼等所请”而为之。非深知丹溪者,则难以写得这样深刻透彻。据宋、戴二氏之文,可知丹溪亲撰的著作有《宋论》、《格致余论》、《局方发挥》、《伤寒论辨》、《外科精要发挥》、《本草衍义补遗》、《风水问答》等。二人都没有提到《丹溪手镜》,如果是丹溪所作,特别是晚年的著作,更不可能不提及。

丹溪名贯江浙,门人和私淑者甚众,冠以“丹溪”二字的书名也极多。但从宋濂、戴良二氏的记载来看,凡丹溪亲撰的著作,书名中均无“丹溪”二字,相反,凡书名冠以“丹溪”二字者,则“多为门人所为”,或私淑者所撰。如杨珣撰《丹溪心法类集》四卷、程充撰《丹溪心法》四卷、方广撰《丹溪心法附余》二十四卷、卢和撰《丹溪纂要》八卷、赵良仁撰《丹溪药要》、刘纯撰《丹溪发明》等等,其余如《丹溪医案》、《丹溪脉因证治》、《丹溪秘传方诀》、《丹溪集》、《丹溪医论》、《丹溪治法语录》等书,皆为后人所撰,《丹溪手镜》自当亦不例外。宋濂《墓表》云:“先生所居曰丹溪,学者尊之而不敬字,故因其地称之曰丹溪先生云”。所以朱丹溪自著书均不以丹溪名,而后人所辑书,均以丹溪名,有由来也。
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《丹溪手镜》一书,并非丹溪亲撰。

黑龙江中医学院 程宝书

百合汤治胃痛验证有效

读您刊1982年第8期“运用百合汤治疗胃脘痛的体会”一文,深感素谓平淡无奇之此方,重新验诸实践,颇有疗效。仅列验证一则,供同道参考。

于××,女,29岁,工人,1982年10月19日初诊。胃脘灼热刺痛20年左右,痛无一定规律,大便经常偏稀,噎气呃逆间有发作,经治疗时效时不效,未能根治。查其舌红无苔,右脉沉软、左脉沉细软微滑,遂按气郁化火、中热阴伤胃痛,以百合汤加味施治。处方:百合60克,台乌12克,白藜藜15克,川楝子10克,杭芍15克,炙草10克。服两剂灼痛若失,便秘噎呃亦瘳,患者十分欣喜。继服4剂,至今随访旧恙未作。

陕西省宝鸡市中医医院 唐宗儒